

從歸僑到外籍

—印尼台灣人移民的歷史過程，兼談客家文化的影響

楊聰榮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藍清水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生

第三屆「『跨界流離』國際學術研討會

世新大學 社會發展研究所主辦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五 年 十 月 七 、 八 日

從歸僑到外籍

—印尼台灣人移民的歷史過程，兼談客家文化的影響

楊聰榮*

藍清水**

摘要

現代社會中的族群形成，實為移民所致。移民有先來後到，構成移民的人群型態自有不同。然而由特定地方來的移民有其連續性及變異，則可能因為移民社會認識移民的方式不同而有所改變。換而言之，對移民的認識，必須對移出地與移入地兩端分別加以考察，移出地會產生變化，移入地也會產生變化，兩者對於移民的認識都會產生重大的改變。本研究原來是針對從印尼來到台灣的客家人，卻發現由印尼移民到台灣的客家人，是一個歷史持續的過程，他們都經歷了一個身份上的轉變，由印尼住民成為台灣住民，才是影響其身份認同的主要因素。然而身份與國籍的認同，印尼與台灣兩地卻都隨著時間的改變起了變化，因而進入台灣的文化身份也因此起了改變。

關鍵字：台灣移民、印尼、歸僑、外籍、客家、認同

* 楊聰榮為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 藍清水為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生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ethnicity in the modern society is usually caused by migration. The immigration happened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would shape immigrants in some different types. Immigration came from a specific place often had its continuity and its change, sometimes it caused by different attitudes from the host society in some extent. In other words, we must investigate respectively both sides of migration, from homeland to host society, in order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immigrants. Both societies would change over time, including the attitudes towards immigrants. This research originally dealt with the Hakka people who came from Indonesia to Taiwan. But the finding showed the migration itself from Indonesia to Taiwan was the key factor to understand the phenomenon of Indonesian immigrants in Taiwan. This phenomenon has a long tradition, which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the 1950s. The Indonesian immigrants in Taiwan went through a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of identity from Indonesian to Taiwan. But the social contexts in both places, Taiwan and Indonesia, are quite different between early stage and the recent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people came from the same place was categorized from returning sojourners to foreign nationals.

Key word : Taiwan, migration, Indonesia,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foreign national, Hakka, identity

壹、前言

本研究建立在不同範疇的研究基礎上，原來以客家研究為主軸，探討由印尼移民台灣的客家人，探討客家族群對原鄉與他鄉的看法，以及認同及適應的問題，主要以訪談法為主。後來發現雖然由印尼移民台灣者，客家人所佔的比例相當高，然而就其移民意識的影響，是以前由印尼到台灣的移民過程影響較大，故改以印尼為主軸，輔以歷史文獻分析與深度訪談為方法，記錄這些由印尼移民台灣的「新台灣人」，其越境遷移方式，由遷移史實及移民類型，討論移入社會對其遷移現象理解的改變。

就移民研究而言，研究目標集中在來自印尼來的移民，相較於台灣目前多數的研究將所有東南亞來的移民放在一起討論，是希望能拓展台灣移民背景的多樣性，強調移入國的背景，因此以不同的移入國背景分別進行不同的研究，期望能以此深入台灣的移民現象。作者之一的楊聰榮，曾經以越南社會如何看待在台灣的越南人來討論越南裔配偶(楊聰榮，2005)，主要希望能以不同的類別來豐富對台灣移民的認識，因此在此並不是採用以常見的移民台灣的時間來劃分移民的背景，而是將不同時期來自同一個地方(印尼)的移民現象聯繫在一起，分析其移民原因、背景與發展，希望不同的劃分方式可以得到不同的視野。

雖然本研究已經由研究初期時期以客家為主軸，改變為印尼為主軸，但在本論文在書寫的過程中，仍保留客家研究的討論，做為理解研究對象的一個重要側面，並且將討論相當因素重要性的比較。就客家研究而言，客家學界長期漠視移民問題的研究，這主要還是因為移民研究難度高，執行不易。從事客家移民研究，必須對不同地區國家的歷史、語言以及社會文化有所理解，才容易取得成果。然而在印尼移民台灣的過程中，客家人的身影顯而易見，在本研究的田野調查中，

多數報導人是來自客家爲主的地區，但並非都是客家人，但是來自客家聚集地區的移民多數可以講客家話，多數華人移民在印尼時期仍然過中國節慶及保留風俗習慣，但也有受到印尼本地不同文化的影響，其中有些受訪者在印尼家中是使用客家話爲主要的溝通語言。因此保留研究中所討論客家文化的影響，可與和其他的文化因素互相比較。

本研究之所以用「印尼台灣人」作爲研究對象的稱呼，是參考美國對於不同血緣的美國人，會冠以血緣國或地域的名稱，如 *African-American* 代表非裔美國人，*Asian-American* 代表亞裔美國人，是基於多元文化主義的理念，尊重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而賦予一個適切的分類。在目前台灣所流行的四大族群中，顯然難以涵蓋這群人。即使加上五大族群觀念下的「新移民」，然仍不足以說明這群人的移民經驗，這群人之中最早來台灣者，是在 1950 年代就來到台灣，當時是以歸僑的身分前來台灣。一直到 1970 年代持續地有人以婚姻或就學的方式，成爲台灣的一員。1990 年代以來，更有透過跨國婚姻仲介，成爲爲數眾多而引人注目的「外籍配偶」，這些合法進入台灣，卻似乎被邊緣化的一群，如何讓他們擁有一個等同於其他族群的身分，應該是值得去探討與努力的方向。

本研究之進行，主要是希望以個案研究的方式，建構由印尼移民台灣的客家人，討論其族群的移民類型，建構一個長時間的移民歷程的認識，研究成果也可拓展其他回流台灣的非客家移民，研究客家僅僅是集中在移民所具有的文化資源，用來與其他因素做比較。其後的討論會述及，當移民具有較多移入國的文化資源，會影響其適應當地社會的速度，但是對其文化認同的特性而言，未必是最具影響力的因素。就研究的對象而言，台灣的移民的多樣性可以在這裡展現，就研究議題而言，印尼客家台灣人是來台灣的國際移民中一個突出的例子，而時間跨度則包含不同歷史的移民，可討論華人移民的處境以及客家族裔的移民特性，並且以歷史情境做類型學的比較。

研究的第一階段以訪談為主進行，由作者之一藍清水執行一項一年期研究計劃，訪談重點為目前移民台灣時間較長的印尼客家人，再與目前研究近期新移民的研究成果互相對照。研究樣本是採取主要有五個源頭，以滾雪球的方式增加訪談對象，並且建立不同時期以及不同因素移民台灣的受訪人員名單。五個源頭以分別是以號稱代表全體印尼來華人士的團體，主要是中華民國印尼歸僑協會，代表教育體系的是華僑師範教育的退休校長，代表印尼華人因特殊歷史事件而集體來台者，則訪問位於龍潭鄉九龍村的華僑新村，代表來自特定地區的印尼華人則鎖定亞齊，以亞齊來台灣的義工媽媽為主，近期的移民則來自中央大學研究生從事外籍新娘研究的訪問對象。¹

貳、相關文獻回顧

關於移民的相關研究很多，所提出來的理論也不少。一般性的理論，有跨界遷移理論，沒有一個國家不是由各地的移民世代繁衍的結晶，人們遷徙的方式有千百種，原因也不一而足。在中國歷史上，區域的盛衰與民族的遷徙息息相關，所以說移民史就是一部人類社會發展史(黃誠，1997)。這些人會選擇遷移，可能是遭受政治的迫害，可能是因為天然災害，也可能是社會文化的因素，更多可能是追求最佳的經濟生活。將移民區分為：屯墾移民(Settlers)、契約勞動移民(Contract Workers)、專門技術移民(Professionals)、沒有身分的勞動移民(Undocumented Workers)、難民和庇護申請者(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這些人會主動地從一個國家遷移到另一個國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們相信遷移

¹受訪名單的建立，分別得自印尼歸僑協會邱亮實理事長，以及出身華僑師範教育的何良泉校長，中央大學客家學院謝淑玲同學則提供她的論文的受訪對象，華僑新村則由龍潭鄉九龍村游村長親自引路。來自亞齊的受訪者主要是來自一項亞齊援助計劃的亞齊關懷小組，受訪者包括來自亞齊的客家媽媽和海嘯之後到台灣求學的青年學生。在此一併向協助建立受訪者名單的人士致謝。

會使生活更美好，事實上國際遷移是經濟或地緣政治交錯影響之下的產物(Stalker, 2002: 17)。

有從經濟動機來分析國際移民的理論，例如 Larry Sjaastad 認為移民行為的發生，視當事者對付出的回報是否高於預期的估算而定，這是以經濟學的觀點來探討移民的成因，是以個人最大效益作為行為的判準(Sjaastad, 1962: 80-93)。然而 Michael Todaro 則認為移民難以準確估算回報是否高於付出，據以追求最大效益。「推拉理論」是與新古典經濟均衡理論相近的移民理論，此派學者認為，人口增長、缺乏就業機會、生活水準低落等因素會產生「推力」，而缺乏勞動力的國家就相對的會有一股「拉力」，於是就會有移民行為產生，而且認為透過移民，將使開發國家和落後國家間的工資及貧富差距將會逐漸彌平，進而達到經濟的均衡(Todaro, 1976)。Marcus Lee Hansen 曾經用移民的「推拉理論」有效地說明了 1870 年前，歐洲移民遷徙至美國，是因為歐洲經濟蕭條所產生的「推力」，促成美國經濟的繁榮，但 1870 年以後美國由農業國轉成工業國，其經濟結構產生歷史性的變化，美國經濟週期性所產生的「拉力」，就又成為歐洲移民潮產生主導的力量(Hansen, 1962: 496)。

也有學者發現，許多貧窮地區的人並沒有移往富裕的區域，如歐盟成員國家的國民可以自由地在歐盟裡移動，但是歐盟三十五億人口中只有 500 萬人未居住在自己的母國；或是高所得國家，如紐西蘭離開的人比遷入的人多，證明推拉兩股力量之間並沒有絕對地關聯存在(Sassen, 2006)。導致大規模的國際移民，還有自然災害所造成的移民，政治性的因素，如柏林圍牆倒塌，東德居民大量湧進西德；戰爭與動亂，如黃巢之亂造成中原客家族群南遷至閩粵贛山區定居；宗教因素造成歐洲新教徒飄洋過海到美洲大陸；勞動力的輸出讓菲律賓傭工遍及亞洲及中東地區，其他如二十世紀二零年代，日本政府鼓勵日本國民大規模移民中國東北，這是政府政策所形成的移民，這些都是跨境移民的顯例，由此可知移民行

為經常不是單一因素之下產生的。

移民行為尚有複雜的因素存在，Oded Stark 認為資金的取得和就業條件的改善，以及對經濟與社會危機的回應，也是導致移民行為發生的重要因素，新古典經濟均衡理論是以經濟的視角看待移民行為，是以移民輸出的供給面為出發點，忽略了政治和國家政策對移民行為的影響，故勞工移民新經濟理論是對新古典經濟均衡理論的修正，同時，移民行為並非全為個人自由意志的選擇(Oded Stark, 1991)。國際現實上，移民經常是集體行動，如鼓勵移民是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國家的國策，也確實吸引了大量的他國移民，再如墨西哥雖然在土地及資源上並無缺乏，但仍大批大批地湧入美國，根據美國 2000 年人口普查結果顯示，美國之西語裔人口約佔美國總人口之 12.5%，已超過非洲裔的 12.3%，成為美國最大的少數族裔。其中墨西哥裔人口約為 2,064 萬人，為全美人口之 7.3%，佔美國西語裔人口之 60%，再加上美墨邊境，每天上演的驅逐、逮捕行動，即可證明移民主要是集體的行為(徐勃毓，2004)。

也有從歷史結構面來討論國際移民的形成，特別是受到馬克斯主義的觀點影響而以資本主義對移民的影響為分析主軸的學者，如 Saskia Sassen 認為世界政治經濟的不平衡發展，導致國際移民成為服務資本主義的廉價勞動力，之所以會有大量的勞工移民，是殖民主義、戰爭以及區域間發展的不平衡導致的(Sassen, 1988)。Sally Findley 則發現移民輸出國，農業商品化進程的社會效應，對促使移民行動有密切關係，則舉出貧窮、失業、經濟發展落後都不是移民的直接原因，也不是決定移民去哪個國家的因素，所以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決定移民的是，商品、信息的國際流動，國際移民是市場經濟全球化之下的結果 (Findley, 1987)。然而特定地區之間如果經濟活動頻仍會增加移民，Erol Ricketts 的研究中發現一個移民趨勢與移民接受國在移出國的投資曲線呈正比 (Ricketts, 1987)。

有學者從勞動市場的結構來理解移民的行為，認為開發國家的勞動市場可區隔成資本密集和勞力密集的兩個不同層次，由於開發國國家的勞力，對所得高，福利佳、高安全的工作趨之若鶩，對危險性高、骯髒、報酬低的工作卻是不肖一顧，這就造成開發國家對此類勞動力的內在需求產生，此一理論有效地解釋了，為何較發達的國家經濟不斷發展，勞動力卻仍不足，而引進外籍勞工，這是以勞動市場的需求面，來探討移民行為(Michael Piore, 1979)。有學者更進一步指出移民網絡(Network Migration)和移民鏈(Migration Chain)對移民的影響性，他們認為：在移民族群自身形成的經濟圈對其原鄉的人會產生吸引力，而該經濟圈的運作需要引進新的低廉勞力，以增強其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再則由於族群經濟圈的形成，移民企業家的地位更顯突出，原居地人群往往從這些成功者身上汲取移民的動力，進而採取移民行動(Portes, 1995)。自願性的移民大多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經濟生活，一旦所移居的區域資源枯竭，移民就會遷移，以尋求更好的地方，因此移民常有「再移民」的傾向，這種再次遷離移居地的行為，稱為「二次移民」，也正是本研究的研究重心。

移民的社會適應，也有不少的討論。任何一個移民，到達接受國之後，馬上就會面臨異文化的衝擊，移民是選擇融入？還是選擇維護自己的傳統？抑或在兩者之間擺盪？這三個選項最後對移民會有何種結果產生？Alfred Sauvy 認為一個國際遷移者在到達移住地後，需歷經定居 (settlement)、適應 (adaptation)和完全同化 (total assimilation)三個階段才算完成遷移行動 (Sauvy, 1966: 460-462)，所謂定居就是在生活上的社會網絡的支助，在生活或精神上獲得支持，適應則是指個體順應或適應新環境。通常移入地社會文化差異越大，遷移者適應過程愈困難，若是語言不通、信仰不同、種族偏見或階級歧視，會增加適應之困難，同化則是遷移者與當地的社會文化同化，這是適應的最佳狀態，但是會同時失去自己族群的主體性，而適應會在語言文化、政治參與、經濟生活三個面向進行，早期來自歐洲的移民由於有與盎格魯文化相近的背景，故移民同化的過程較為順利，

而現今美國移民的歷史與文化背景與美國文化差異甚大，因此同化過程艱辛，衍生的問題也較多(Portes and Bach, 1985)。

參、印尼華人移民的歷史背景

本研究討論來自印尼的移民歷程，因此有必要對於印尼華人的歷史加以考察。海外華人遍佈全球，人口最多者當屬東南亞，其中又以印尼人數最眾，據文獻記載，印尼華僑社會形成很早，早期就有不少華人到當今是印尼的領土上定居。到了十九世紀末期，因列強的施壓，加上中國國內的動亂，如太平天國革命、義和團運動、戊戌政變，以及孫中山領導革命的暫時挫敗，斯時有不少革命者出洋逃難，其中到印尼的就不乏其人。

關於在印尼的華人人數，根據廖建裕的統計，在印尼獨立(1945年8月17日)前華人占印尼人口數的2.8-3%之間，約等於600萬人(廖建裕，2002)。李學民、黃昆章則稱：「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約有250萬人，至20世紀80年代初期約有440萬人(一說600萬)」(李學民、黃昆章，2005：19)。另據王受業等人所編的「印度尼西亞」書中稱目前華人約占印尼總人口的4%，即800萬人(王受業等，2006)，三者說法雖有出入，但是印尼應是海外華人最多的國家。

如果以其中的客家人而言，目前各種數字的推估主要來自荷屬東印度政府時期，中央統計局在1930年人口調查，因為祇有在當時進行了對華僑祖籍地的統計，後來的數字都是推估而得，根據荷印政府1930年的人口調查，在印尼的客家人總數為200,736人，僅次於福建人的544,981人。黃昆章推算截至1996年客

家人約占印尼華僑人口的 30%，居五大方言族群的第二位(黃昆章，1996)。客家移民主要居住在印尼的蘇門達臘北部、邦加島、勿里洞、西加里曼丹、西爪哇等地，由於客家人最早是在西加里曼丹落腳，而契約工則多被招募到邦加、勿里洞，所以這些外島的客家人比爪哇島多(莊國土，1994)，客家移民歷經好幾百年，而能生存下來，足證他們是克服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等的困難，而且與其他的族群維持了良好的整合和互動，這便有賴客家族群展現他們堅韌的適應力和強大的活力(鄭赤琰，2002)。這為數龐大的客家人，有的在印尼落地生根，融入當地且中國意識薄弱，有的卻仍以當中國人為榮，有的更是世代秉持「寧賣祖宗田，勿忘祖宗言」的古訓，在異國面對欺凌、壓迫，仍能完整地保留客家族群的語言、風俗、習慣，而且世代代與當地居民和睦相處。

在印尼的部份華人即使在這種的條件下，仍因某些歷史的因素，再次放棄了幾代耕耘有成的基礎，選擇跨越國界移居世界各地，其中一部份的客家族群，即落腳在台灣；這群可能是因政治因素、也可能是經濟性動機、或是透過跨國婚姻仲介遷移到台灣的客家新移民，從原鄉跨界遷移至異族與異文化的印尼，又遷移到同文同種的台灣，他們如何面對一些制度性的社會結構問題？與在地人的互動又是如何調適的？以遷移的時間而言，有在印尼排華前來台升學的，有排華後遷居台灣的，又有一般婚配嫁來台灣的，我們稱之為「華僑」的，也有八零年代開始以「商品化跨國婚姻」仲介方式遷移到台灣的，我們又以「外籍配偶」稱之。

肆、由移民型態看「印尼台灣人」

過去印尼的華人的移民研究中，以二次移民為主題的比較多，這是我們假定

了印尼華人對於其如何移民到印尼，有清楚的記憶，在實際的訪談過程中發現，多數來自印尼的「新台灣人」，對於其祖輩來到印尼的歷程，並無清楚的記憶，許多人連自己祖先的祖籍都無法說得清楚。經過訪談結果，以及參考華人移民史的文獻，比較國內外的移民類型，我們可以發現，目前定居台灣的印尼客家人，其來台灣的途徑或動機可概分為下列因素。一、因升學而移民，二、因排華事件移民，三、因媒妁婚姻移民，四、因仲介通婚移民。雖然大抵不同的因素，在來台的時間順序上有不同，早期來台定居者，以升學及排華事件等因素者居多，而在1970年代以媒妁婚姻為多，1990年代以仲介婚姻為多，但是其實各個時期不同的移民類型都有，一直到最近，四種不同類型的移民動機都有。

一、因升學而移民

印尼華人在當地設立華僑教育場所，最早是在1691年在巴城的華人公館倡議下設立的私塾式義學，1900年有私塾和義學439間，1901年第一所新式學校—中華學堂成立，但是到1934年為止中學只有21間(李學民、黃昆章，2005)，顯然要接受高中以上的華文教育，就必須到印尼以外的地區了，在抗戰前後返回中國大陸升學是首選，1949年以後就可以選擇到大陸或台灣升學，資料顯示，1954年至1961年台灣因接受美援，共計有11,432名海外僑生返台升學，其中印尼留台的畢業僑生有599人(華僑志，1978)。

在訪談中發現，其中一些來台升學者，因為受到1959年印尼排華的影響而留居台灣，因此移民來台的原因並不是截然劃分開來的。1959年11月18日印尼公佈了總統第10號令，規定住在第一級和第二級自治區和州的首府以外的外僑小商販和零售商從1960年1月1日起必須停業，這是根據1959年5月14日印尼商業部長頒佈吊銷縣級以下地區外僑零售商營業執照的決定而制定的〈詳見周南京等譯，

1998：91-92〉。直接受到影響的華人達五十萬人，而尤以西瓜哇最激烈〈黃昆章，2005：142〉，西瓜哇為客家人較集中的地區。在編號1的訪談中，三位受訪人都是在來台升學讀高中時，因為總統第10號令而滯留台灣，並在此落地生根。編號8的受訪者，雖冒險返回印尼，被拘禁，釋放後又以假護照出境來台，繼續未完成之學業，目前也與同是印尼歸僑的先生在台結婚生子。

二、因排華事件移民

印尼近代歷史上，發生多次排華事件。1958年因為印尼認為台灣當局介入印尼本地的叛變，因此將所有的右派學校關閉。1959年至1961年印尼排華事件，直接受到影響的華人達五十萬人之多，華僑華人為了爭取生存被迫逃離印尼者，有十三萬人。1965年發生九三〇事件，是印尼近代史上規模最大的動亂。九三〇事件據稱是印尼共產黨企圖掌握實權失敗，印尼軍人上台執政，他們認為華僑支持共產黨，干涉內政，於是掀起反華排華浪潮。1966年4月北亞齊省的華人被強迫在8月17日前離開亞齊，幾個月內至少有1至1.5萬名華人逃難到棉蘭。1970年代及1980年代，局勢已經比較和緩，但仍有排華事件發生。

由於1949年之後國民黨在印尼傾注了大量人力與物力，所以在20世紀50年代末，大約有30%的印尼華人在政治上傾向於國民黨，據估計20世紀50年代中期為止，印尼約有245萬華人，有140萬人為新客華人，William Skinner在20世紀50年代末期的調查，80%以上的土生華人對中國的認同是“weak or nil”，依此推算30%約有55~60萬人是傾向國民黨的(劉宏，2002：108)。在各種型態的排華運動發生後，通常都會有印尼華人設法遷移至台灣定居(華僑志總志，1978：747-749)，唯人數很難統計，總數難以評估。

三、因媒妁婚姻移民

1970年代左右透過人際關係來台旅遊、打工、探親的印尼客家女子，在台期間接受親友的介紹，與台灣籍的男性相識，進而透過書信交友，最後有遠嫁台灣，而成爲台灣媳婦者；在研究者的訪談對象中，就有號稱「亞齊媽媽」者，她便是以這種模式嫁來台灣的，此後她又受託轉介印尼故鄉的親友二十餘人，也透過先交友後婚嫁的方式嫁到台灣，其後因台灣有親友而陸續依親移民台灣者亦不少，用「媒妁婚姻」，是因為這些人用傳統的先友後婚的模式，雖然也會有聘金之類的禮俗，但比較不像八零年代以後流行的買辦式婚姻介紹，且她們嫁到台灣的時候，台灣對她們的稱呼是「印尼華僑」，雖是一種「他者」的稱呼，但是這個稱呼卻是帶有一點「旅居國外的自己人」的感情，有相當程度的「我群」意義存在。

四、因仲介通婚移民

由於工業化、都市化和國際社會及人口的改變等導致對婚姻媒介服務的需求增加，1970年代後，媒介機構如婚姻介紹所和交友俱樂部開始發展出不同的方式和服務，它們將女性對象鎖定爲亞洲或較貧窮的歐洲國家的女性，並且以男性顧客的喜好爲主，經營方式愈來愈商業化（蕭昭娟，2000：8）。

夏曉鵬（1997）的研究指出，在此同時，台灣地區也因「南向政策」而與東南亞地區有接觸機會，在台商的仲介下，使得漁村、農村等台灣邊陲地區中娶不到媳婦的男子亦逐漸跟進此國際通婚的浪潮中，他也指出印尼新娘願意遠渡重洋嫁來台灣，除了因爲台灣經濟發達的吸引力外，原鄉的生活赤貧及一夫多妻的習俗更是她們想離開印尼的推力，所以說在國際通婚中女性可藉此提升階級和或去較好的生活（夏曉鵬，1997）。蘇裕玲（1995）則發現在新竹北埔鄉的「進口新娘」，

以印尼的客裔婦女居多，在研究者的訪談對象及親友的外籍配偶亦為印尼客裔，可見農村的客家男性若娶外籍配偶較傾向娶語言相通的客裔婦女。

伍、從客家特性看「印尼台灣人」的社會文化適應

在歷史上移民往往是構成族群特性的原因，族群特性通常是不同的移民互相互動出來的關係所塑造成。以客家人為例，客家之得名，是與原居地的土著相對稱。土客之爭即是起因於在地人與移民之間的族群互動，也是客家意識形成的重要源頭。然而，客家族群在移民史的研究上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其族群特性經過發展出來後，即使移民其他地方，仍可保持一定的風貌，是以其移民分布地區廣而著稱。客家族群以移居見長，在歷史上經常一再遷移，甚至跨越國境，展現出強大的環境適應力，雖然變遷在所難免，但仍能保持一定特性。

本研究討論來自印尼的客家人之移民歷程，看看這些印尼客家人，客家生活特性，是否對其適應本地生活有所助益。客家人在過去被稱為民系，「民系」一詞係羅香林(1992)在「客家研究導論」中，首次提出，是「用以解釋民族裡頭種種支派的」。從客家源流來看，客家民系的歷史形成，實為移民所致，根據羅香林在「客家研究導論」中所論，客家民系在歷史上有五次大遷徙。除此之外，近年另有蔣炳釗(2000)的「客裔互動論」和謝重光(1999)的「文化概念說」亦被論者所重視。不論客家的源流如何，族群在不同的歷史時空下，與不同族群的互動是很重要。土客之爭即是起因於在地人與移民之間的族群互動，也是客家意識形成的重要源頭。王甫昌(2004)在「當代的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中認為：族群意識是來自於群體之間的「差異認知」、「不平等的認知」、「集體行動必要性認知」；

而王明珂(2005)則在「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中提出群體間的邊界認知是畫分「我群」與「他者」的族群意識的起源。客家人因遷移而與本地人之間有認知的差異當屬必然，加上互相爭奪有限的資源，因而產生敵我的對立，亦是難免。故可謂「客者移民也」，常以客人(guest people)面貌出現。

在本研究的田野調查中，多數的受訪者來自客家聚集的區域，但是並非都是客家人。其中來自客家聚集的區域者，不論是不是客家人，都會說客家話。其中一位報導人是第四代移民，但在移民地仍然過中國節慶、風俗習慣也仍保留原鄉的模式，並且繼續使用客家話為主要的溝通語言。在田野調查中，客家人的認同是存在的，有幾位在言談中即以「我們客家人」表示，但是認同並不強烈，多數在與當地人做比較時，仍以「我們中國人」或者「華人」表示。編號 06、07 的兩位報導人，以「番」來區別彼此的身份，並表示身為中國人是優於在地人的。

受訪者的客家文化資源是否對其適應台灣的生活有幫助？廖正宏(1985:167)認為遷移不只是居住地點的改變，更重要的是必須面對新的社會情境與規範，因此，遷移者必須調整其價值觀念與行為模式，而適應於新的社會文化系統中。跨境移民在遷移到新居地後，隨即會面臨諸如語言障礙、就業、人際關係、生活型態與社會文化等適應問題。這些文化包含了語言、服裝、住宅或烹飪等等，即不論衣、食、住、行、用、玩、娛樂、各種技術和生活方式以及待人接物、婚、喪、祭、祀、宗教信仰等活動（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一冊，1971），這些都是在日常的生活當中進行，所以社會文化的適應也可以是生活的適應。以下擬就語言適應和生活適應兩方面，觀察移民台灣的印尼客家人，在適應上的情況。

語言的適應是多數討論到移民問題是經常討論到的問題，廖正宏(1985:173)認為；就國際移民者而言，遷移者首先必須克服語言的障礙，語言不通將多少影響遷移者的人格，無形中會變得較內向或自卑，又根據徐榮崇和姜蘭虹（2004）

的研究，移民適應問題中，語言的障礙排第一位，而且語言的障礙會造成就業上的困難，學生則面臨課業的壓力，小孩子則受到歧視，另外也因為語言不同，不易溝通，而形成同祖裔群集的現象，不利於融入當地主流社會。

在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中，來台升學者，都能說客家話且至少接受過大學教育，其在語言的運用上與台灣本地生可說是相同的，因此完全無語言的溝通障礙；因排華來台者或以婚配方式來台者，由於在印尼幾乎都受過華文教育，會講華語，少數不識字，不會說華語者，也都會說客家話，故至少能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的溝通，加上婚配對象大多是客家人，自然就無語言障礙存在，縱使婚配對象是閩南人或外省籍，也都可透過華語溝通，故在家庭生活，可減少直接因語言障礙所帶來的誤解與摩擦，而移民定居之處又屬於客語地區，雖然可能有腔調上的差異，但也都能達到溝通的目的，而增加了與社區人群的接受度，所以較少有語言上的適應問題，這在跨國移民的適應上是屬於較佳的適應現象。

在生活適應方面，由於原鄉文化會深刻影響其適應台灣環境的速度，當不同的文化傳統接觸就會產生衝突並進而調適移民一般對在地的法律不熟悉、缺乏文化資本、生活習慣、價值觀、甚至於飲食等也都會有些許的差異；謝淑玲(2005)的研究中發現印尼客家人在飲食上偏酸辣，與本地的口味有相當的出入，其他生活上的差異，大約要三年左右才能適應。

在本研究個案中因升學移民者，因來台時為青少年且均集體住校，初期在飲食方面雖有稍許的不習慣以及學業上與本地生有一點差距，但是在當時的僑生優惠辦法下，並未構成太大的困擾，至於其他方面的不適應，就是想家而已，很快地就適應了，這可能與學生社交圈小及所需要擔負的責任有限有關，此後他們雖隻身在台，但在政府的照顧之下，和自己逐漸建立的人際關係和社會網絡下，可說是完全融入台灣的社會中，最後又以在當時而言的高學歷，在初、高中擔、任

教職，較諸當時台灣大部份民眾的生活條件為好，受訪者中如為來台升學者，多位畢業於師範大學，一是國中校長退休，另兩位為國中及高中教師退休，餘一人為台大畢業後，返回雅加達在當地華校教書，繼當選第一屆僑選立法委員，都是躋身於中產階級之列，其社會階級與成就並不亞於台灣本地人。求證個別的移民情況，是否得益於客家文化的影響並不大，在台灣他們主要仍與台灣本地人以國語交談，反而是教育機會影響日後的成就。

至於因排華因素移民者，因所居之處為客家地區，語言溝通較沒有障礙，容易融入當地社會，且初期均聚居一處，在社會扶助方面有來自彼此的照應，加上當時的僑務政策是積極爭取華僑對台灣的向心力，所以訂有多項優厚的辦法，以協助歸僑²，使屬於跨國移民的歸僑免於居住的困擾，這對移民初期，有相當的安定作用，此一政策值得與約當同時的其他國家跨國移民政策作比較。

以媒妁婚姻移民者，因為幾乎都是透過本地的親友或同是印尼歸僑的媒妁結婚而移民台灣，少數因工作或經交友過程而嫁來台灣的，也可視為有親友在台灣，所以他們的生活適應，在飲食習慣上雖也有短暫的不適應，但是一般生活的打理上，都能很快適應，大多數表示為了更好的生活沒有不能吃的苦，但問他們吃過什麼苦，也都僅表示本地人能吃的苦他們也能吃，這是否與當時台灣的經濟仍處於落後，一般民眾生活也窮困有關，且當時工作機會也不如現在多，工作環境也不如現在的講究，仍相當多的保留了傳統農業社會的遺風，一般人都仍甚刻苦，以至於這些以媒妁婚嫁移民台灣的一群人，能快速的融入，其中一位報導人更表示，來台灣之前，已經在雅加達擔任過裁縫店的師傅五年，常與陌生人接觸，

² 當時訂有華僑貸款辦法〈華僑志總志，1978〉，由政府擔保向相關行庫貸款，編號 06 的報導人就說：「這個房子是民國五十年蓋的，蓋房子的時候是拿土地跟僑委會貸款〈問：是跟僑委會貸的嗎？〉，是僑委會擔保去向銀行貸的，房子蓋了，貸了兩萬五千塊，開始的時候，我們也沒有錢繳，好幾年都沒有繳，……最後才一次還掉了」，由「好幾年都沒有繳」的事實來看，僑務委員會除了協助歸僑取得建屋貸款，也可能協助利息延滯者，房屋能免於被拍賣，這在當時的爭取海外華僑的反共的國策下，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透過親戚介紹來到台灣後，剛開始工作沒著落時，都是與其他同鄉聯絡或聚會，在外面遇見本地人也都能以國語溝通，開始裁縫工作後，就與雅加達的經驗相同，所以完全無適應上的困難。

因仲介通婚移民台灣俗稱「外籍配偶」者，在相關的研究中都指出由於婚配雙方是在仲介買辦方式下，以速成法完成終身大事，雙方僅透過影像傳達印象或集體相親方式，在僅僅知道對方年紀或個人資料後就決定了，是一種屬於買賣方式的商業行爲，由於雙方是以供需爲前提，關於結婚後所有可能衍生的問題，可能考慮極爲有限或是未及準備，因此「外籍配偶」在台灣產生語言障礙、信仰衝突、飲食不適應、價值觀不同、文化差異、對原生文化的依賴、社會融入等等問題(謝淑玲，2005)。葉淑慧(2004)則歸納國內對於外籍配偶來台後可能面臨的生活適應的研究結論，計有：婚姻生活適應不良、婆媳親戚之間的問題、語言的困擾、國籍間的歧視問題、工作權問題、教養子女問題、文化差異之困擾、居留證與證件問題及識字教材及識字學習之研究等。所以本研究的對象，因爲都能操流利的客家話及足供一般生活溝通之用的國語能力，所以在語言溝通上的困擾較少，但是都有婚姻生活的適應困擾，婆媳的相處也是婚後的適應問題之一，有研究指出，姻親關係常是影響婚姻穩定與品質好壞的重要因素。在許多姻親關係中，又以婆媳之間問題最多，此種現象中外皆然，無論國內外婆媳常因家庭角色之重疊，如操持家務養育小孩等意見不合及欠缺溝通技巧，而產生衝突帶來壓力(鄭玉秀，2004)；關於前一項，幾乎是新婚者都曾有過，但是印尼配偶原生家庭的成長經驗，是一個應該投以更多關注的項目，後者在婆媳姑嫂同炊共爨的情況下尤常發生，並非印尼客家籍的配偶才有此類困擾，但是移民配偶在社會支助相對缺乏的情況下，尤其顯得無助而必須被更用心地予以支持並提供協助。

陸、從台灣社會脈絡看「印尼台灣人」的國家認同

吳乃德的研究指出：國家的選擇受情感和理性兩個力量牽引，前者是一種心理的感情取向，一種歸屬，是情感性的終極價值；後者是的國家選擇是基於理性的利益考慮。前者稱為國家認同，後者稱國家選擇(吳乃德, 1993：44)。施正鋒則認為：國家認同是對於國家機器或政治體制的認同，或是「效忠共同的一套價值觀、象徵以及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因為移民通常不願意放棄在母國的權利(像是返鄉、財產權、繼承權、參與全國性選舉的權利)，但也不想完全整合入居住的國家裡(施正鋒，1999：178)。由於在歸化過程中，常常充斥了許多關於認同和忠誠的問題，但是移民其實並不願意接受這些質疑(Sassen, 2006: 178)。

李明歡的研究則指出，跨境移民在接受國一般要經歷定居、適應和同化三個階段。移民進入接受國時，由於大多不懂、或不能熟練掌握當地語言，缺乏進入主流社會的管道，因此只能先在邊緣地區設法落腳立足，以廉價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求生。由於存在與主流社會的隔閡，移民靠群體內部的互相幫助克服困難，由此可能進而形成移民小社區。在定居、適應的過程中，有的移民可能較先獲得「成功」而得以提升自己在移入國的社會地位，其表現往往是：他們在居住地點上離開原先的移民社區而進入當地社會的中上層住宅區；在社會交往中力圖進入主流社會的交往網路；在行為舉止上以主流社會的上層人士為樣板，最終褪盡自己的「異性」而被主流社會接納為「自己人」。這些「先進者」作為同源移民族群的榜樣，將為其同伴積極仿效。於是，越來越多的移民將接受主流社會的文化，認同於主流族群，進而實現完全同化(李明歡，2000)。

學者卻在許多研究中發現，跨界移民經常形成一個高度自治並自給自足的

「移民共同體」(Immigrant Community)；而此群體和其「團結」被視為妨礙移民同化於移居國社會，但是現在移民共同體卻扮演了聯誼、互助和提供同化於移居國社會的協助(廣田康生，2005)。但是 1984、1985 在瑞典和的德國的調查，卻發現了跨界移民對取得公民身分缺乏興趣，而 Tomas Hammar 的研究則發現移民因對母國的認同、忠誠和渴望回去，而不願意歸化；甚至在未考慮回去母國的第二代移民身上亦然 (Hammar, 1985: 446)。

在本研究中由於印尼客家台灣人，移民台灣的時間點、教育背景、動機的不同，因此在國家認同上也有些微的差異產生；因升學移民、因排華移民、因媒妁婚姻移民可歸為一類，八零年代以後以仲介婚姻移民是一類，之所以會以此分類，是研究者在訪談中強烈的感受到他們之間的差異。由於母國語言的教導與母國文化的描述，可有效地將移民與母國維持了某種聯繫(王玉環，2004)，在本研究對象的前三類中，因為都受過華文教育和都能說母語故呈現較高的文化認同和和國家認同意識，不識字不會講華語的也都是居住在客家人為主的地區，雖身在印尼則仍以中國人自居，而視印尼當地人為「番」³，可見語言的保存有助於認同的增強。

因升學移民者之所以選擇台灣做為升學的地方有其歷史的淵源，十九世紀末世界興起民族主義風潮，中國也受其影響而有了孫中山的民族革命運動，在革命期間，海外的華人特別是南洋的華人出力最多，國民黨在海外遍植機構招募黨員，並支持華校開辦；1949年之後國民黨在印尼傾注了大量人力與物力，所以在20世紀50年代末，大約有30%的印尼華人在政治上傾向於國民黨(劉宏，2002：108)，這些歷史因素與現實促成了部份印尼的客家人認同了國民黨主政的中華民

³ 在訪談中所有的報導人都稱印尼當地的人為「當地人」、「印尼人」、「土人」，只有一位移民第四代不識字的報導人，仍以「過番」稱移民印尼的行為，也以「番人」稱呼當地原住民，可見她們家族在歷經四代的移民，仍保持了相當多的歷史記憶，而這歷史記憶的建構和維持，是移居環境所致。

國政權，但是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海外華人在兩個都自稱代表中國的政權之間，在可同時學習華語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之間面臨了抉擇的兩難，一旦選擇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所在的台灣做為子女升學的地方，其實就代表了他們的國家認同傾向，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五年的印尼排華運動，雖然也是造成他們停留台灣的因素之一，但是一九七一年台灣退出聯合國，相對中國大陸在國際間的影響力愈來愈強之際，他們仍然選擇留在台灣，這應該也可以解釋為對中華民國的認同。

因印尼排華事件而受到直接影響的達五十萬人，當時中國大陸曾派出軍艦接運願意返回大陸的印尼華人，選擇來台灣的均必須自費⁴，在離境的約十三萬人中，返回中國大陸的達9.6萬人(黃昆章，2005)，計有近兩千名印尼華人遷移至台灣定居(華僑志總志，1978：747-749)，其中一位受訪者甚至於在丈夫因為大陸有姊姊而想選擇回大陸時，斷然與丈夫劃清界線，她還說當時常聽台灣的中央廣播電台的節目，且它的三哥就是共產黨員，可見他們對中華民國政府認同的程度。

因媒妁婚姻移民者，因為嫁到台灣的時間較早，且都幾乎都受過華文教育，誠如前述，國民黨對華校的支持和掌控，使印尼的華人有強烈的中國意識，而在黨國界線還不是分得很清楚的年代，中國意識與國民黨的認同是可以劃上等號的，而國民黨主政的中華民國就成為認同的主體了，再加上中國大陸一九五六年開始的僑務政策將歸僑資本收歸國有，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又將歸僑知識分子、上層人物和僑務幹部劃為右派，進行嚴厲的批判(王功安、毛磊，1999)，再經過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運動，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迷失的十年」，到一九七八年四人幫下台文革結束為止，二十年之間，整個中國大陸成為一個封閉且混亂的體制，讓許多海外的華人望而卻步，在既不願意成為印尼人又不敢回歸中國大陸之際，加上同為中國人的感情紐帶的牽引，台灣自然成為中國認同的唯一選

⁴ 編號 01 及 06 的受訪者，都表示當時中國大陸派出軍艦免費接僑民，選擇到台灣則需自費。

擇。

印尼自從一九五九年排華之後，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七日頒布華人換名手續決定書，開始全面要求華人同化於印尼，此後又對外僑(主要是華人)訂定了諸多的限制，如強迫歸化、關閉華校、限制旅行等，所以在四十歲以下的土生華人多沒有受過華文教育，因而不諳華文，是以印尼語言為交流思想的工具，對中國陌生，感情淡薄，認同印尼文化，而且不喜歡被稱為華人或華僑，而自稱是印尼人或華裔，即使是住在鄉下的客家人到城鎮，也必須改用印尼語溝通(黃昆章，2005)。而再根據蔡仁龍(1993)所作的「印尼華僑華人認同的轉向」調查發現，85%以上的印尼華僑華人不再把中國當作宗祖國，93%把印尼當成是自己的祖國(黃昆章，2005)，故自八零年代開始以仲介婚姻移民台灣者，其國家認同與前述者是有很大的差異存在的，這種認同現象在她們以國際通婚移民到台灣的初期或遭到壓力及挫折時，會傾向認同印尼為宗主國，但是在有了小孩，時間較長，與原生地的聯繫減弱之後，會逐漸地認同台灣—中華民國(謝淑玲，2005)。

柒、研究結果的商榷

如果我們從長時間的角度來看待印尼移民台灣的人，許多因為一時的現象而造成的刻板印象應該可以重新評估。由印尼移民台灣已經形成一個長時間的傳統，這個傳統使得後來採取同一路線的移民要來得容易許多。也因此我們即使在理解所課的「外籍配偶」或「新移民」現象，也應該要記得，這是一個更長的時間累積下的現象，並非一時興起的現象。婚姻仲介是否存在固然對於這種移民有推波助瀾的效果，但是不宜將所有的印尼移民來台灣的人視為同一種機制而來台

灣的。至少由當事人的眼光而言，就覺得難以接受。

因此由印尼移民到台灣，經濟因素不是促成跨境移民現象的單一理由，在台灣目前流行對台灣新移民的刻板印象，很容易以經濟因素的影響來理解這些新移民。在訪談中我們發現兩種現象，一是原先只是來台灣升學讀書的學生受到印尼排華的影響而留居台灣，以及在印尼原鄉直接受到印尼排華運動逼迫而選擇移民台灣，是屬於政治因素，另外則是與本地人交友進而結婚的一群，及經過他們介紹嫁來台灣的配偶，可視為社會網絡的擴張，均與經濟無直接的關聯性存在。惟以仲介婚姻移民者似乎比較有強烈的經濟動機，但是不能忘記在當地社會其他移民的因素長期存在，移民的動機也受到當地社會對於移民台灣的理解。

此外，從長時間的研究，可以看出這些印尼台灣人，在早期對台灣的社會文化有較強烈的認同。1980 年代以前印尼台灣人對中華民國有較強的國家認同，這是因為有國民黨的網脈在其中起了主導性的作用。1990 年代之後雖然較不明顯，但是同樣的機制仍然存在，不同年代從印尼來到台灣的不同人群，也很容易以這樣的機制互通聲息。1990 年代之後從印尼來台灣的新移民，國家認同可能有轉變，這個轉變是因為印尼與台灣在這段期間，都起了重大的變化。然而除了國家認同因為時局的變化，因而產生內容的變化，但是新移民對於台灣社會以及所蘊含的中華文化，仍然存有一份好感。

早期的印尼台灣人，認同意識中顯然政治的意識較強。來台升學的受訪者，在印尼都是讀華校的，顯然對中華文化的認同較強，而選擇到台灣就讀，則可視為對中華民國的國家認同高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認同，尤其在一九五九年印尼排華政策發生後，中國大陸曾派出軍艦接運印尼僑民返回中國大陸，選擇來台灣者則必須自費購買機票、船票，在此對比之下仍選擇到台灣來，更是證明國家認同的強烈傾向，其中一位受訪者甚至用大陸五星旗沒有青天白日旗美麗，強調他

堅定的國家認同對象，這種現象似可推論為國民黨長期對海外，特別是東南亞工作成果的展現。而現在新移民之中，這種政治意識已經漸漸淡化，但是認同台灣社會，在接受台灣為其新的歸宿，仍有相當高的動機。這是印尼來台的新移民的特性，與其他地區的移民可以比較得出來。

此外，印尼台灣人之中，社經地位有很大的差別，而家族經濟活動活躍者，其社會流動移向高層的機會較大。在受訪的對象中，其家族成員所從事的是商業經濟活動時，則會設法將子女送到台灣接受教育，這與中國傳統的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價值觀脫離不了關係，而擁有較高的學歷，也確實讓其中幾位受訪人在台灣這個對他們屬於客居地的社會中，擁有不輸於台灣本地人的社經地位，而在印尼從事農工活動者，相對教育程度較低者，則可以發現其在台灣的職業屬於勞動階級，其中一位受訪者在印尼四代務農，而四姐妹都是透過媒妁婚姻的方式移民台灣的，在經濟上屬於附屬的地位，其留居印尼的家族成員，也因印尼排華因素而失去土地，目前均失業在家，故可證明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具為社會的流動重要因子，活躍的社會經濟活動有助於社會階級的流動。

因為台灣政經環境的變化導致印尼台灣人我群關係產生變化。1980 年代以前台灣的政治環境尚屬戒嚴時期，與中共採取的是漢賊不兩立的政策，因此沿襲傳統的僑務政策，積極爭取海外華人對中華民國的認同，故在此之前移民台灣的所有海外華人統稱為「華僑」，雖也是屬於一種「他者」的稱呼，但是這個稱呼卻帶有一點「旅居國外的自己人」的情感，有相當程度的「我群」意義存在，1990 年代以後台灣的本土意識抬頭，解嚴之後，台獨的呼聲更是高漲，連倡建中華民國的國民黨，在台灣都被稱之為外來政權，遑論由海外移民台灣的印尼客家人了，被污名為「印尼新娘」或稱之為「外籍配偶」，正是政經環境改變而政策修正後的結果。

參考書目

- Findley, Sally E., *Rural Development And Migration, A Study Of Family Choices In The Philippine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7).
- Hammar, Tomas, "Dual Citizenship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 438–50, (1985).
- Hansen, Marcus Lee, "The Third Generation in America," *Commentary*, 14: 496. (1962).
- Ricketts, Erol, "U.S Investment and Immigration from the Caribbean." *Social Problems*, 34: 374-387(1987).
- Sassen, Saskia, *Territory, Authority, Rights: From Medieval to Global Assemblag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 Sassen, Saskia, *The mobility of labour and capital: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labour flo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Sauvy, Alfred, *General Theory of Popul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6).
- Sjaastad, Larry A., "The Costs and Returns of Human Migrat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2, 70(5): 80-93.
- Stalker, Peter, "Migration Trends and Migration Policy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40(5), (2002).
- Stark, Oded, *The Migration of Labo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asil Blackwell, 1991).
- Portes, Alejandro and John Walton, *Race, Clas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 Portes, Alejandro and Robert L. Bach, 1985 *Latin Journey: Cuban and Mexica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ortes, Alejandro, 'Economic sociology and the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A conceptual overview,' in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A. Portes (Ed.),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p. 1-41. (1995).

Piore, Michael J., *Birds of Passage: Migrant Labor and Industrial Societ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Todaro, Michael P., *Internal Mig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1976).

Yang Tsung-Rong Edwin (楊聰榮), "Hometown is Fatherland: Nanyang Chinese Searching for New Identity in Malaya and Indonesia, 1945-1949" *Essays on Ethnic Chinese Abroad*. (Taipei: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 2002).

Yang Tsung-Rong Edwin (楊聰榮) "A Short History of Anti-Chinese Riots in Indonesia, 1941-1998"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Indonesians*. Michael R. Godley and Grayson J. Lloyd ed. Pp. 41-54. (Sydney: Crawford House Publishing, 2001)

王功安、毛磊編著，〈華僑華人與國共關係〉。武漢：武漢出版社，1999。

王玉環，〈法國的移民與其認同問題之研究〉，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王希，〈多元文化主義的起源、實踐與局限性〉，《美國研究》，2000年第2期。

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4。

王受業、梁敏和、劉新生編，《印度尼西亞》，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5。

王英文，〈關於歐洲移民遷往美國的原因問題——兼評“拉力”與“推力”理論〉，《世界歷史》，1994年第1期，東北師範大學歷史系，頁101-105。

- 吳乃德，〈省籍意識、政治支持和國家認同〉，《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國家政策研究中心，台北：業強出版社，頁 27-51，1993。
- 李明歡，〈20 世紀西方國際移民理論〉，《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 年第 4 期，廈門大學。
- 周聿峨、阮征宇，〈當代國際移民理論研究的現狀與趨勢〉，《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 年第 3 期，暨南大學。
- 施正鋒，《台灣政治建構》，台北：前衛出版社，1999。
- 徐勃毓，〈美國墨西哥裔移民發展之研究〉，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4。
- 徐榮崇，〈澳洲臺灣移民居住地的選擇與決策過程—以雪梨、布里斯本和墨爾本為例〉，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
- 徐榮崇、姜蘭虹，〈澳洲臺灣移民的空間性與地方性：居住地的選擇與決策思考〉，《人口學刊》，第28期，2004年6月，頁81-107。
- 馬銘譯，廣田康生原著，〈移民和城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 莊國土，〈鴉片戰爭後東南亞華僑的人口結構〉，《南洋問題研究》，1994 年 01 期。
- 陳麗玉，〈來自東南亞的「新娘」：一個後殖民女性主義觀點的深度報導〉，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 華僑志編纂委員會，〈華僑志—總志〉，(增訂三版)，台北：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78。
- 黃昆章，〈印尼客家人的地位與作用〉，《八桂僑史》，1996 年第 4 期。
- 黃誠，〈湖南東江庫區開發性移民的理論與實踐〉，《湖南經濟》，第 4 期 1997 年，湖南資興市委，頁 26-29。
- 楊聰榮，〈移民與本土化—中國戰後移民在亞太各國的遭遇〉，「重建想像共同體—國家、族群、敘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

會，2004年，頁21-22。

楊聰榮，〈從越南觀點看越南台灣人(Vietnamese-Taiwanese)：越僑全球化與移民精神〉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第二屆「跨界流離」國際學術研討會：公民身份、認同與反抗」，台北，世新大學國際會議廳，2005年11月20日。

葉淑慧，〈東南亞女性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與補校學習－以竹北市中正國小補校為例〉，中華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廖正宏，〈人口遷移〉，台北：三民書局，1985。

廖建裕，〈現階段的印尼華人族群〉，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八方文化企業公司，2002。

廖珮君，〈澳洲回流台灣年輕移民在台、澳間社會的適應與自我認同〉，台北市立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劉宏，〈族群與國家觀念的迷思－以後殖民時期的印度尼西亞為例〉，《海外華人論集》，郝時遠主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鄭玉秀，〈從婆媳互動看台灣中產階層婦女覺知的家庭圖像〉，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蕭昭娟，〈國際遷移之調適研究：以彰化縣社頭鄉外籍新娘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

謝重光，〈客家源流新探〉，台北：武陵出版社，1999。

謝淑玲，〈在臺客籍「印尼」與「大陸」配偶之客家認同比較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台北：南天書局，1992。

蘇裕玲，〈族群社區與族群書寫－當代台灣客家意識展現的兩個面向〉，台北：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